



J U N I O 2 0 1 1

¿POR QUÉ EL APRENDIZAJE DEL CHINO MANDARÍN PUEDE GENERAR BENEFICIOS DE LARGA DURACIÓN EN EL BIENESTAR DE UN PAÍS COMO CHILE

P A P E R

RODRIGO A. FÁBREGA-LACOA, PH.D UCORP-CHILE;
JORGE A. FÁBREGA-LACOA,
PH.D UNIVERSIDAD ADOLFO IBÁÑEZ-CHILE
Y KARINA F. PIÑA PÉREZ MBA (C)
CORPORACIÓN CRUZANDO EL PACÍFICO-CHINA

为什么学习汉语可以让智利长久获益？

选择学习汉语

Rodrigo A. Fábrega-Lacoa 博士
Ucorp-Chile

Jorge A. Fábrega-Lacoa 博士
智利阿道夫·伊巴涅斯大学

Karina F. Piña Pérez, MBA (c)
跨越太平洋协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赵雪梅 蔡琦（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特别鸣谢 Francesca Hanshing Urra 女士

圣地亚哥，北京
2011 年 5 月

为什么学习汉语可以让智利长久获益？

十九世纪会讲法语是受过教育的标志。到了二十世纪英语取代了法语。二十一世纪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取代其他语言而占据主导地位。未来的趋势似乎是多语言化。到那时就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掌握语言就是力量。时至今日，多语化时代的到来已毫无悬念，各国政府重新开始在学校推广多种语言教育，比如欧洲理事会和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就已明确推出相关政策。

在智利，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已经得到了大力推广，而现在世界上又掀起了一股学汉语风潮。为什么我们要学汉语？这只是教育界又一次的时尚之举，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脚步？

这正是本工作组研究的问题。我们历时八个月，开展三次研讨会，从语言政策的角度去讨论和理解这些问题。

本论文分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关于世界是如何在十八世纪末以后的两百年中从多极化再次变回以欧洲为中心。这一过程可以解释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惯常思维。

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特殊性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西方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将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社会的西化。

第三部分中，我们着重分析汉语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推广的载体，又是如何走进各国以及中国政府为推广汉语教学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为什么学习汉语是极其富有前瞻性的选择，能给国家带来长远的利益？这正是本部分最后要回答的问题。

第四部分介绍了智利中文教学的初步发展以及可喜的成果。

前言：选择学习汉语

1978 年，毛主席去世两年后，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国家的东南部。这是一次实用主义的改革：取得成果的试验将在内陆省份继续推广，而失败的则迅速取消。改革的目的在于：首先，通过鼓励外国投资和大幅降低外贸关税，推动中国经济在国际化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其次，通过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民，鼓励农民出售农产品，以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改革的成效显著：以 10% 的年增长率，中国经济在仅十年内就翻了一番，在三十年内翻了两番。为了让这一变化幅度更加便于理解，我们将中美两国进行比较。二十一世纪初，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八倍之多。而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两国之间的差距减小了一半。20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发展趋势可以预测，中美之间的差距将继续缩小，到 2027 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Ferguson, 2009)

投资是中国爆炸性增长的动力（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0%）。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和外企构成中国投资主体。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外资主要来自香港。外企占中国出口比重超过 60%。然而，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国内储蓄得以取代外资，1981 年，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而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期，这一数值增长到了 45% 以上。这一增长的结果就是，当前中国家庭平均会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储蓄，与美国家庭 6% 的储蓄率形成鲜明对比。(Jacques, 2009, p. 160)

与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时进行的，还有它经济结构、劳动力和城市构成的彻底转变。改革带来了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的移民潮，这一移民过程使得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二十世纪中期的 60% 骤降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略高于 15%。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所经历的变化之大，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因此，中国的转型受到了全球知识分子、政客和企业家的密切关注。对中国转型的这种兴趣可以归因为中国的内部因素（如它几千年的历史、政治体制、广阔的面积和它的语言等）和外部因素（中国进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美国复杂的财政状况、其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联合国等一些在美国势力下产生的多边机构的势力相对减弱、新型国际机制的兴起）。

十年前，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给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和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一问题，学者们莫衷一是(Plate, 1999)，但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时，显而易见的现实让他们达成了共识(Ferguson, 2009)。事实证明，我们即将迎来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

让许多人都意识到新世界秩序的产生的，并不只是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毕竟，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中国之前就已在经济上经历着类似的奇迹。早在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初，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就已开始。当中国大陆还处于改革初期时，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维持高速增长已逾二十年。而日本经济腾飞比其亚洲邻国要早了近百年。因此，如果我们仅着眼于经济方面，在二十世纪末，怀疑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实际影响无可厚非。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全面地分析这一现象，就有理由相信新世界秩序的产生，这理由并不是些数据，而是因为这些数据产生在中国。历史性的新闻就是中国本身。早在工业革命前，中国曾是最具活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相比来自于外国的影响而言，对这一时期就已埋藏下的条件的利用才是中国崛起更重要的原因。比如，正是因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欧洲才得以在水力、农业、数学、音乐理论、航海等许多方面取得重大科技成就，并且作为媒介使得全世界受益。从火药、地震仪、指南针，到玫瑰、白兰地、威士忌、茶叶、纸张，甚至柠檬、橘子和桃子，都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世界。

但是，当现代化使欧洲经济腾飞之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这时，中国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而欧洲的势力却扩展到了全球。那两百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源于欧洲思想和制度被移植、复制到了世界各地。于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逐渐成形，它们有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围绕着由几个工业化大国组成的权力中心，而这些大国大多是欧洲国家。在这两百年中，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深入人心，那就是认为自由民主制和开放的市场具有道德上和经济上的优越性，倾向于建立一个包括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巨大消费群体的大众社会。

所以，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其他国家花费很长时间才取得或者未能取得的发展。而且中国的发展有它自己的方式，并未采用上文提到的那种理想的发展模式中的制度。

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的觉醒是否会带来习俗与制度的西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开放会使其受到西方怎样的影响，而其他国家又会受到中国怎样的影响，如何适应中国，适应中国的信仰和制度。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长，新的世界秩序逐渐产生，中国在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都将由这些问题的答案所决定。

本文中简要介绍了中国巨变的特点。通过这些特点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被解释为其风俗及制度的西化。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至少 3000 年的文化延续性。考虑到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应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而非一个民族国家。因此，与其说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追赶其他国家早已达到的发展水平的过程，不如说是中国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的过程。

理解中国特殊性的关键是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之前没有发生文化上的分裂。维持统一的基础在于儒家思想、全国共同的语法体系、种族的单一性以及国家的概念（国家的合法性不是基于程序而是依赖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随着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实力复兴，民族自豪感增强，汉语将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将汉语作为第二或第三外语

的学习将会给个人和世界各国都带来机遇。只要中国能够达到预期的发展，中文的学习必将带来长远利益。

一、巨龙觉醒

（一）两个文明分道扬镳：1800 至 1978 年间欧美的崛起和中国的停滞

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并没有中国发达，在一些方面中国甚至领先很多。比如，中国的远洋农产品贸易（非常类似现在的国际贸易）是欧洲的六倍之多。(Pomeranz,2000)中国的活力是建立在长期发展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的，而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并没有这种发展。这是由于在中世纪，中国农民拥有自由，是土地产出的主人，而欧洲农民则是封建地主的仆人，没有在地主封地之外销售农产品的自由。这些都有助于中国人形成复杂的商业头脑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进取心。当这两点在中国已初露端倪之时，英国甚至还没开始工业革命。

十九世纪初，欧洲在其他方面也没有领先于中国。比如，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平均年龄相似（都在 35 岁到 45 岁之间，因为性别和地区而有所不同）；欧洲成年人人均热量消耗为 2500 卡路里，而中国人为 2600 卡路里；中欧的出生率差别也并不大(Pomeranz,2000)。总而言之，即使算上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在十八世纪末，不管是在能力上、资本上、进取精神上，还是在生活质量上、知识水平上，欧洲都并不比中国强。

如果说在十八世纪中欧两地的差别不大，甚至在一些方面中国更发达，那么，在十九世纪，两地的差距就渐渐拉大了。英国开始了一段很长的扩张时期，逐渐成为现代历史上的第一强国；而中国经济直到 1970 年都停步不前。Pomeranz(2000)认为，中欧两地自十九世纪以来产生的差距——也就是现在世界秩序的基础——产生于偶然，而不是欧洲所谓的优越性。1750 年前后，两地都面临着马尔萨斯主义中所描述的会影响到国家发展能力的过程，也就是持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减少的可耕种土地及能源之间的矛盾。但是，欧洲得以摆脱土地稀少的限制，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殖民，殖民给欧洲提供了无限的新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大量煤炭资源的开发提供了除了木材之外的能源，使得技术上由蒸汽机取代了密集的劳动力。

当时，中国东北部虽也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作为能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但昂贵的运输费用使得煤炭难以取代木材。结果，中国经济出现了停滞，而欧洲却因为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经济能力、军事水平以及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十九世纪的世界秩序由此形成。

（二）西方霸权

十九世纪欧洲的发展成就了几大殖民帝国，其中最强大的就是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欧洲帝国都保持着实力，不断扩张。一战后，欧洲帝国迅速衰落，而等到二战之后，美国发展成为了超级大国。因为美国人的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虽欧洲衰落，美国兴起，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的西方影响从时间上来说却是持续性的。这样，在二十世纪末，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构成

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最重要一极。

为什么当代世界秩序以西方国家为中心？除了上文提到的经济因素之外我们还应考虑到政治因素：在十九世纪初，中国和欧洲的政治高层在统治的侧重点上有着重大分歧。欧洲统治者欣然接受了使用煤炭的新技术和殖民带来的工业发展和领土扩张的崭新机遇。因此，欧洲民族国家转变成了有着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企图的军事机器。与此同时，已是帝国的中国却在儒家思想的教导下将精力放在维持不同地区间的和睦相处上，发展必然会带来地区间的不平衡，这不是中国政府所需要的。(Jacques,2009)

在邓小平接替毛泽东之前，中国统治者都无意通过市场机制增加财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从未有过（直到现在也没有）富人能拥有可与国家权力制衡的自治权力，从而分享或挑战政治统治。欧洲政府长期与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宗教集团在内的其他政治势力分享权力，而中国政府的霸权却从未受到过威胁。这样一来，在中国，商人要维持和保护自己的生意，就必须和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而在欧洲，商人们在民族国家中组成了拥有自治权力的集体，统治者必须与他们分享政治权力。这就使得欧洲国家保护商人的经济利益，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规，推动财富的增长。

这样的分歧使得中欧两地的命运截然不同，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在经济上影响深远。大不列颠帝国兴起，军事、经济实力以及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都迅速提升。因此，十九世纪中叶当中国拒绝和印度（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开展鸦片贸易时，已无法抵御英国对其领土的威胁。结果，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败中国，侵入中国领土。在这之后的一百年中，欧洲城市化、工业化，而中国依旧维持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都几乎没有变化。

总而言之在十九世纪，多极化的世界缓慢但系统性地转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欧洲霸权以及后来的美国霸权，在近代世界表现为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理想模式、价值观和制度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语言通过殖民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因为英国曾是第一强国，后来美国取代了这一位置，英语变成为了国际贸易、科技和知识领域的通用语。这些都使得现在人们很自然地将发展进程等同于采用欧洲文明的习俗和制度，也就是：民主，个人自由，不论信仰、种族或其他任何归类的人人平等。

（三）现代化等于西化

在任何社会中，经济繁荣都会使得人民为其祖国感到自豪，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因此，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必然会让中国人重新重视自己的根基、传统和习俗，而振兴汉语正是关键所在。要预测中国的发展还为时过早，所以回顾欧美的这个过程将帮助我们理解。

现代欧洲文明形成之前曾有过一次深刻的文化巨变。这一巨变始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起源于路德教派改革，后来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阶级斗争中，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断的斗争中又重新开始。

因此，当欧洲国家经济腾飞之时，欧洲人在近代史上没有什么可以感到骄傲的基础。因此，欧洲人都需要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这就推动了对于更久远的历史以及幻想的未来的关注。基本上有欧洲人在过去有三个共通的方面：(1)重新善意地解读雅典民主（强调公民的概念，将辩论作为达成共识前的必要准备）；(2)合法的帝国建立在古罗马帝国法律的基础上（将原本自治的个人相互联系起来的宪法概念以及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都起源于古罗马帝国的法律）；(3)犹太教—基督教影响的世俗化（概括说来，第一是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一说法转变为人人平等的哲学思想，第二是，基督教末世论中认为死亡之后人才能得到救赎，基于这一思想，欧洲人认为事物的意义存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依靠上文提到的三个基柱获得重生，到达顶峰。其社交关系建立在公开平等辩论的基础之上，后来这种辩论转变成具有宪法性质的规则。这些思想使得欧洲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带来的转型过程中保持了连续性。因此，经济成就才能伴随着民族自豪感的产生，具有文化上的意义。结果到1800年前后，欧洲就出现了一系列文化资产，例如理性主义原则、法律框架、国家的分权、人人平等的信仰以及进步的概念。正是这些原则使得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的资本主义变得意义非凡。

欧洲所创造的这些思想和制度在当今世界无处不在，导致人们很难想象出一种不是基于这些原则的发展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原则将资本主义与民主变为了不可拆分的两部分。这种思想在西化的社会中的影响非同小可，以至于任何有别于此的发展模式都被认为是社会的转型期，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发展并不完善。

换种说法就是，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新的发展要想取得成就就必须西化，采用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正如 Max Weber 指出的，也许欧洲文明确实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基础，因此任何渴望发展的地区都必须经历欧洲所经历的过程。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任何发展过程都必须具有 Ferguson(2009)在欧洲腾飞过程中强调的六个特点：(1)将经济活动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上；(2)采用科学方法；(3)在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法律和政治体系；(4)具有扩张意愿；(5)发展以积累为中心的工作道德观；(6)形成大众消费群体。

中国的发展过程具有除第三点之外的其他所有特点。因此，西方视角都一致提出疑问，在中国人追求更多政治自由的巨大压力（在欧洲人看来是这样的）之下，中国共产主义制度还能坚持多久？然而，因为中国并不像欧洲那样经历过文化上的分裂，中国人并不具有注重个人自由和自治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将国家视为一种社会契约。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回首过去，中国是可以现代化而非西化的。

中国的腾飞发生在21世纪初，这时它不具有19世纪欧洲经济飞速发展之时所拥有的条件。首先，当欧洲发展之时并没有面临外部威胁，而欧洲发展过后所有的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这种威胁（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国家因为其与英国的紧密联系总能获得与其他殖民地、欧洲以外国

家不同的待遇)。其次,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欧洲先是在宗教方面后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经历了漫长的内部冲突时期。再次,自相残杀的战争、长久的冲突以及随后到来的文化分裂使得欧洲人形成一种观念,那就是人应该是自治的个体,应当与他人理性地讨论自己的思想,在讨论的基础上建立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东南亚和中国文化都认为社会统一的精髓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

只有欧洲、其殖民地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给二十世纪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贸易系统。当时世界第一大国大英帝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贸易系统,那就是向其殖民地出售制成品,购买食品及原材料。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扩张使英国得以充分发挥其工业优势,而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则使英国有能力防备其他国家新兴工业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欧洲的霸权如日中天。除了那些在人种上明显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没有任何国家能在工业方面与欧洲抗衡。欧洲帝国的财富不断累积,到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了顶峰。最终在 1914 年,欧洲帝国的扩张利益冲突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独立浪潮的掀起(印度、几乎整个非洲、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和美国的迅速发展,原本就损失惨重的欧洲各国失去了世界中心的地位。同时,不可挽回的还有大量的欧洲人(包括许多及其优秀的科学家)都默默地移民到了美国,美国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环境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这时美国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1820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世界的 2%。到 1870 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赶超英国了(占世界 9%)。而到了 1914 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945 年后成为了超级大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无数精英从战火纷飞的欧洲来到美国的大学就读。二战后的世界被美国势力所笼罩,以至于许多国际外交和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都将总部设立在美国。

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现代化既没有预先建立好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共同的种族基础。美国梦的思想中体现着平等和尊重个性的原则,而建国者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法律体系。这样一来,每个人获得的机会均等,白手起家的美国人形成了巨大的消费者市场。

即便存在这样的差别,美国和欧洲的霸权依然具有延续性(依靠其语言)。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从此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东欧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逐渐向西方模式转型。在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产生之后,资本主义民主被认为优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形式。这使得一些学者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会开始民主化进程,加入到一个具有全球规模的新型经济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凭借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中国和欧洲产生差距两百年之后,西方势力笼罩着全球,以至于现代化被等同于西化。

然而到二十一世纪初，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逐渐受到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影响，而美国作为二十世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条件也在逐渐减弱。

（四）现代化而非西化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表明了非西方世界的衰落。在 199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不完全符合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残余势力终于消失了。Fukuyama(1992)将这一时期的精神总结得非常到位，他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意识形态上的争端就已结束了，自由主义变为发达世界唯一可行的体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认为中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然而，二十年后在中国依然没有出现改革的征兆。Jacques(2009)甚至提出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在实践中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使得中央政府和一些地区最大程度的地方民主的共存成为可能。

实用主义成为超越任何意识形态控制的必要。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国。1870 年前后，当美国经济开始扩张时，其人口仅四千多万。而 1978 年中国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其人口已经达到九亿六千万之多。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转型的规模巨大，中央政府如果试图控制领土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是不可能的。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政治制度依然稳如泰山，领导着这场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象征着美国实力的双子楼所遭受的恐怖袭击则开始了美国极为复杂的十年。美国在外交关系中奉行的极端的单边主义政策不仅没能增强其军事实力，反而使其面临风险，其军事实力的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暴露出美国作为苏联集团衰落后世界上的领导国地位默认为的合法性。不久之后，美国财政赤字增长到了一两代人无法偿还的地步。物质充裕、大量进口的几十年将由未来几代人来偿付。因此可以预测到未来几十年内美国的消费型社会将会做出调整，缩小规模。如果说着在新千年伊始时事可以预见到的，那么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则将其变为了现实。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近代历史上对自由竞争经济模式最强有力的干预。因此，对华盛顿共识中的新自由主义的信仰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出现了裂痕。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势力减弱的征兆。Jacques(2009)认为美国正面临着帝国衰落的经典模式，那就是出现了维持军事实力的需要（美国必须维持遍布全球的 800 多个军事基地）与不够支付军费的有限资源（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长，而且还是净进口国）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美国羽翼下建立的国际外交机构的衰落。Fallows(2010)指出，最近硅谷某重要企业的 CEO 表示，即使美国在知识生产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种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过去的三四十年中的发明（美国依然是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家最多的国家），虽然无法被其他国家赶超，但是这种优越性正在减弱。

总而言之，美国经济的消费模式必然要做出调整，其境外军事力量必须重组，知识生产方面的优越性也缓慢但确实在减小，许多观察者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霸权的世代将要结束。同时，包括印度、巴西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表明新的机遇将集中产生在没有延续英国模式的社会中。因此，美国霸权的衰落之后很可能就是西方霸权在全球的终结，一段以中国为中心的转型时期也许就在

眼前。

就这样，美国的优势逐渐减小，而沉睡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东方巨龙重振雄风，充满活力。中国并没有修改其政治制度，却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美国的最大贷款国，在抵御继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西方世界中依然普遍存在着一种感觉，那就是未来将发生的转变并不会带来全新的社会秩序，因为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生活方式和特点。换言之，正如 Fukuyama(1992)指出的，人们认为当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时的世界并不会与英国或美国占据这一地位时的世界有很大差别。在这方面，Fallows(2010)提出了一种更加平静地面对未来变化的视角。判断一个社会是否绝对领先于其他社会，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别国出生的人是否渴望融入这个社会、加入这国国籍。这种事在美国依旧非常常见，在中国却并没有产生。根据在北京生活三年的亲身经历，Fallows 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人来到中国追求机遇、做生意或是想要站在世界变化的最前沿，但是很少有移民想加入中国国籍。因此，不能仅凭分析家们眼中中国巨大的吸引力，就断言我们面临着世界秩序的中心国的转变。即将到来的变化比这要小的多。

从这一角度上看，Fallows(2010)还对结论做出了一些修正。未来总有一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越美国，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因此他认为重点不是中国超过美国（要做到这点中国的人均产值只需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而是中国能够吸引最具创造力的人才，或者概括的说就是专业人力资本。中国虽然拥有全球最大的大学教育体系，大学生人数达到 2000 万以上，但是中国最优秀的研究者们依然选择移民到美国，因为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经费并且治学严谨。

总而言之，未来可能的趋势是中国的地位日益重要，但美国并不会退居第二或第三位。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崩溃，而是十八世纪末存在的多极化世界卷土重来。然而，中国的发展并不一定就要适应现有的模式（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认为现代化等于西化是不对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恢复了在没有认识也没有受到西方社会和制度影响之前就已具有的活力。因此，理解中国发展可能带来的冲击的关键并不在于经济方面的数据，而在于隐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社会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中国是如何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价值观和信仰，习俗，仪式和节日，家庭、集体以及汉语所扮演的角色）来发展自己的国家的。

二、中国精神

中国把自己视为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单一民族国家，这并不完全正确。中国的十三亿人口并非源自同一民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许多种族，但现在，90%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汉族。汉族是中国北部、南部和中部人种的混合，是数百年来内部移民、征战割据的结果。然而，关于共同的种族来源的说法出现在近代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是繁荣时期过后兴起的中国民间说法的一部分。

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中国人是否会有其他看法。正如欧洲人重新正视古希腊和古罗马史，中国的进步唤醒了中国人对过去千年历史的骄傲与自豪。这种自豪感中，包含着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就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近代150年来，中国滞后了，部分国土被外国势力统治，这段历史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倒退。因此，未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将重振雄风，同一个祖先的说法也将更加深入人心。在这种发展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是中国教育对种族差异的淡化过程，在中国的教育中道德教育占很大比重，此内容将在后文中进行详述。为了便于理解可以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和历史书中，都将种族间关系——一种摩擦不断的关系——阐述为中华文明的统一过程，而西方人很自然地将其理解成种族之间的征服。

就算花再大力气制造一种民族统一的感觉，也必须要有共同文化实际存在的线索，如此才能展开论述并得出结论。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审视四个方面的线索：中国文化的概念、家庭和社会关系扮演的角色、国家的道德价值、教育系统和语言。

（一）文明与国家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习俗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然而，全国各地又都能感受到其统一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共同的祖先，或者说共同的千年历史，而并非像美国一样建立于多种族的基础上（在美国，民族认同感不是基于共同的过去，而是基于共同的美国梦，那就是自由和个人的努力终将带来物质上的进步）。

一个对中国了解不多的人很可能会认为中国是在近些年才正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因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之后，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才成功统一全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中国人心中，这并非奠基性的时刻。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与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时间、事件不吻合。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并没有，至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作为其历史上的中心时刻。对于历史，中国有它自己的轨迹和理解。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柏林墙倒塌）在中国人眼中只是近代历史上一些短暂的时刻。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重大时刻可以上溯几千年，例如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唐朝（公元610至907年）、宋朝（公元960至1297年）、明朝（公元1368至

1644 年)和清朝(公元 1644 至 1912 年)、十九世纪后期两次鸦片战争、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1931 至 1945 年间日本殖民、1949 年革命(并不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是因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以及始于 1978 年的经济改革(Jaques,2009)。

综上所述,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有失妥当,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一个在基本不变的领土上延续了长达三千多年的民族文明。而且中国的领土之大,可以与一个大洲相提并论。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统一与和谐的价值并非言过其实。它将普通民众与几千年的文明连结起来,让官员和百姓都能一致感受到中国的优越性,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因此即便身处逆境,中国人也一直认为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中心。

中国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在它的文明沉睡之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自然被视作历史的一个片段。毕竟中国屈服于外国侵略势力(英国和日本)不过一个世纪(1840 年代到 1940 年代)。然而,正如满洲、蒙古和印度侵略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即使是屈服于外来统治,中国也从未被迫迎合外来势力,相反的是,侵略者们常常需要适应中国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奇特的是,中华文明的力量之源就是它广袤的领土和多样化的种族。正是这两个因素,让侵略者们任何将其思维和制度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企图都失去实现的动力或可能。要想实现这样的企图困难重重,任务艰巨。因此,虽然中国人屈服于外来统治之下,实际上侵略者们总是允许中国人继续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由此而言,当中国定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时,中国人认为中国如此之大,世界上任何民族或力量都无法真正将其完全征服。同样,中国人觉得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只要想与中国往来,就迟早会承认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优越性和中心地位。在历史上,这种想法就意味着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理解为朝贡与接受朝贡的关系,和睦相处的基础就是这些国家承认朝贡是理所当然的。现如今,虽然没有朝贡之说,但中国已然成为亚洲经济活动的重要中心,同时也是许多非洲国家发展萌芽的主要外部动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盟,现在这些联盟仅限于商业意义上,但很难说是否会在未来带上其他色彩以巩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二) 时间、实用主义和家庭关系网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农业活动转变为工业生产或提供服务。与此同时,人们的时间观念、社会观念也在改变。规律的乡村生活被城市的纷繁嘈杂和快节奏的生活所替代。历史上许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都由几代人才能完成。这是一种代际转换,祖辈居住在乡村,受教育程度低,生活环境变化很小;而孙辈则居住在城市,接受中学教育或高等教育,生活环境充满活力和不确定性。欧洲和美国就是这样。在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所用的时间比中国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例如,英国经过 70 年的发展才达到的阶段,中国仅用了 30 年。在城市化的问题上,1970 年中国仅 1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如今这一数字达到了约 40%。

再次考虑到中国之大，这是一个在不到 30 年中超过 3 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对于城市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这期间产生出许多不平等和社会混乱，其规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不可想象的。在英国，曾祖父辈和祖父辈过着乡村生活，而孙辈甚至曾孙子辈过上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而在中国，处在两种境地的是同一代人。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当代中国交织成一体。

中国动态的经济和人口状况导致现实中一种特有的组合：同一家庭中的几代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中国里。这就形成了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时间观念，这些方式可能和西方人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体会到的大不相同。比如，中国人比欧洲人和美国人更切实地、快速地体会到现实的日新月异。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些变化只是环境的变化，并不会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对于几千年文明的归属感）造成影响。

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建立在对千年文明的归属感之上，而它的载体则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人不是单个概念而是集体概念。因为在每天的生活中一切都飞速变化着——包括居住的社区的样子——中国人生活的意义和持久性并非来源于物质世界，而是来源于他们属于一个千年文化的民族认同感，来源于他们的社交网络（他们的家庭、朋友以及他们接触的人）。比如，关系——利用社交网络来获取相互的利益或支持——对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运转至关重要。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都深深地植根于社交网络中。平等和非歧视规则，这在自由社会视为合法或者至上的规则，而在中国却与忠诚和归属的规则相碰撞。在中国，只有忠诚和归属的规则存在，经济、政治活动的存在和价值才有持久性、有意义。

（三）国家的道德价值

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中国政府从没有过必要与商人这一经济阶层、资产阶级或宗教机构分享权。因此，国家的合法性从来与力量的平衡无关，也与是否建立赋予公民存在的合法性程序无关（如西方民主制度中的选举制）。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程序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这种道德原则过去存在于儒家思想中，现在存在于共产主义思想中，强调维持中华文明的统一与和谐是国家的任务。

正如侵略者们懂得要维持其对中国统治就不能企图完全操控中国，中国共产党在保持中央权威的范围内给地方以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或者说，这是一种效仿君主时代藩属国朝贡的统治方式。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更类似于毛泽东所反抗的儒家思想，而不像苏维埃的共产主义。与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淡化了思想意识层面，更加务实。

对于国家的道德角色，中国的观念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中国不像欧洲那样在现代化之前曾经历过文化层面的分崩离析。中国分裂的原因是外国占领所产生的冲突，而非中国人内部的分歧或权力纷争。因此，中国的政体只是维持对体制的控制，而不去完全地限制地方的权力。中国的精英阶层常常依附于中央政府。在

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拥有自治权力或者有能力与国家权力制衡的群体。所以，很少有条件产生公民运动或利益集团来反对国家的决策。国家维护公民，公民授予国家最高权力，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关系上，上文所述的种种都对这一点造成了影响。因此，公民权力是最高权力的来源这一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历史。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道德中心的角色，这无论是在君主时期的儒家思想中还是现代制度下的共产主义思想中都很常见。这种信仰正是中国政治模式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一点上，孔子（公元前 551 至 479 年）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中都是道德与哲学的代名词。孔子在其著作中将政府定义为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道德基础，因为有道德权威，国家享有积极干预社会活动的合法权利。这些思想与西方自由观念中的国家截然相反（后者最纯粹的版本是对国家的理解是它对于保护私有财产和主动性无益却又必不可少）。

最后，虽然中国自视为一个统一的文明，但在地方层面上尝试不同的政治体制并非天方夜谭，只要它们不危及建立在中央权威之上的国家统一。正如西方文明成功建立起从一院制民主到联邦制的多种政治体制，中国的统一制度下（无论是共产主义）也有可能做出多种多样的社会政治尝试。

（四）教育与语言

中国与西方在国家的概念上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在中国，国家教育民众、“提高民众道德水平”被认为是合法的。这并不是单纯的授予民众受教育权，而是培养学生性格和良好行为的道德义务。无论是在孔子的教导中，还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培养民众的性情都被接受，并且被认为是国家应该做的。这就意味着教育晚辈尊崇长辈和权威，自我约束，努力完善某种技能（不论这种技能是什么）。中国人在这样的教育下变得有耐心、坚韧而勤劳，这在西方人眼里并非偶然。

在这种个性的培养过程中最基础的就是汉语书写的教育和学习。表意的书写形式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要掌握汉语就要学会精准地写出数以千计不同的汉字。笔画上细微的差别就会产生意思上巨大的改变。因此在中国，准确性和不断练习是学习阅读和写字的必经之路。所以在中国教育中记忆至关重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教育中力求创造力，鼓励创新。然而，模仿学习让中国得以取得技术进步，虽然其进步速度对波士顿或硅谷等高端技术中心毫不造成威胁。

前文中已经阐述过中国近年来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异同，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人们所熟知的西方信仰是一个挑战。西方观点普遍认为，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是不断复制欧洲从十九世纪以来出现的价值观、思想和制度（至少要采用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我们也谈到中国的发展并不依赖于西方，而是重新挖掘出了它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沉睡的特质，我们可以把这种特质称为中国精神。

这一部分阐明了中国精神具有一些将其与西方区分开来的特点。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之前，并没有经历文化危机时期，没有被迫在每一个新变化之后都重新寻

找民族认同感。相反的是，植根于几千年历史的认同感使得中国人在巨大的变化面前保持着镇定和耐心。因此，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中国人极其重视家庭团结，这对这种世界观的传承至关重要。在受到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影响的社会中，纪律和良好行为的教育都是建立在罪恶感的基础上，而在中国这种纪律则建立于羞愧感之上。在小集体之上，中国人期望国家承担起维持社会和谐、确保文化延续的重任。这些都依赖于教育，尤其是汉语的教育。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漫长的历史进行分析，就是要说明中国经济的起飞意味着世界力量的重组，并使我们面对新的世界秩序。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在的工业发展道路，再过两年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的发展并不会使其采用或是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相反，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和独特的民族特点都会加强。因为上文所述的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汉语的传播及其地位的巩固是中国立足世界的战略性元素。汉语不仅代表着中国特性，而且通过汉语还可以扩大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而对于那些希望从中国振兴带来的机遇中获益的国家，理解中国人的准则、生活方式和性情至关重要，要想做到这些就必须学习中文。在下文中我们将阐述学中文所带来的挑战，并且回答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智利鼓励人们学习汉语将会给智利带来长远的利益。

三、汉语

从发展走势中可以看出，中国将在二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将面临消费模式的巨大转变，它的影响力和实力也会有所减弱，减弱的幅度足以使得十九世纪前存在的多极化的世界重新出现。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对于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念是一种挑战。因此，自视为世界中心、因为拥有千年文化而骄傲的中国，一旦成为发达国家，必将让现今的发达国家受到挑战。这样的前景很好地解释了西方逐渐增长的理解中国的兴趣，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希望扩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但并不是以殖民或是武力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中文必将带来长远的益处。能直接用中文交流显然会带来更多商机，但益处不仅仅是这些，还包括一些更重要的内容：掌握中文能让人理解一个不遵循西方发展模式而发展的文明，从而能够预测即将到来的世界平衡和不平衡问题。

未来中文对世界的影响一定比现在大很多，因为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更多的国家都会渴望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虽然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中文，但中文的多种形式（普通话、粤语、吴语、闽语）都使用同一套汉字。在中文的多种形式中最流行的是普通话，有超过十亿人在使用。确实，普通话是东亚贸易中使用的语言。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短期内英语还是商业、科学界和外交中最重要的语言。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语言(尤其是汉语普通话)会变弱或是受到英语影响而改变。Graddol(2004)称,根据世界人口数据,从二十世纪的走势和二十一世纪的趋势可以看出,到 2050 年,母语为英语的人口将会降低至世界人口的 5% (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数字为 9%),而中文则一直是世界上被作为母语使用最多的语言。他指出,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多语言化。也就是说,英语的主导地位将日渐式微。

当中国继续保持飞速增长,将有更多的国家学习中文,尤其是其他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和马来语言跟汉语而不是英语更加相像。因此,在这些地区汉语普通话教学规模不断扩大。在日本,现在提供汉语普通话课程的学校数量已经增长到 1990 年代时的三倍以上,汉语普通话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 (Ramzy,2006)。在韩国,汉语普通话已经成为了必修课,一万三千多名韩国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习(在华留学生中,韩国学生比重最大,参见 Ding2008)。在印度尼西亚,自从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总统解除了前任苏哈托颁布的使用中文的禁令之后,学习汉语课程的人数骤增。而新加坡政府更是鼓励国民学习中文。

现在,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达到 19 万人,其中 75-80%都是亚洲学生,中国为世界上超过 185 个国家提供高达七千万奖学金。另一方面,2010 年共有 127 万中国学生正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

欧洲的数据展示出了这股汉语教学热。2008 年有 300 多名各个年龄段的人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参加了汉语水平考试 (HSK)。人们学习汉语的原因多种多样:商务、旅游、学业需要等等。

在英国,一些小学和中学除了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之外,从 2006 年开始也开始提供汉语课程(公立或私立中学和小学中有 10-13%提供某种形式的中文教学)。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越英国,政府大力推广英语教育;有趣的是,英国的年轻人们现在也非常热衷学习汉语。法国已经有 27 所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或课程,中学教育也是如此。截至 2004 年,超过 9000 名法国学生申请了去中国的留学签证。

虽然身处亚洲之外,但是英国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增长了 60%。在一些学校,从 10 岁开始中文是必修课。在巴黎,1994 至 2002 年间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增长了 170%。如今法国已成为全世界参加中文考试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美国,中文课程(4%的学校开设)的数量与西班牙语(93%的学校开设)和法语(46%的学校开设)相比还略少,但中国却越来越成为美国交换生的首选目的地(关于这一问题,Graddol 在 2004 年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汉语将成为吸引最多发达国家学生的语言)。近十年来中文课程数量增长了十倍,而法语和德语课程不增反降。1997 年 64%的学校提供法语课程,24%的学校提供德语课程,到 2008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减少到 46%和 14%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U.S. Schools: Results of a National Survey 2009*)。巴拿马国会已经在讨论是否将中文列为必修课程(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主要用户)。

根据 Ding(2008),全世界母语非汉语的汉语学习者数量已经超过了 1300 万。约 100 个国家的 2300 多所大学提供汉语课程。如果汉语教学继续发展,汉语就

不仅是世界上作为母语被使用最多的语言，而且还将成为作为第二语言使用最多的语言。这种趋势已经受到了市场的认可：一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企业的人力资源专家中展开的调查表明，他们中 38% 的人都认为在未来几十年汉语将成为贸易中最有价值的语言（Ding, 2008）。总而言之，如果以为中文在衰落，或者认为中国最终会采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机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让汉语成为东南亚地区贸易用语，加强汉语在全世界的使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对中国管理制度存有的疑虑，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1987 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近十五年来，超过六千人被授予对外汉语教学资格。另外，中国还建立了志愿者计划（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作为加速推广汉语的手段之一。截至 2006 年，中国向 34 个国家派出了 1004 位汉语教师和 1050 名志愿者。2004 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了“汉语桥”工程，在世界各国建设孔子学院，以推广中国文化。截至 2010 年，已经有 322 所孔子学院和 369 个孔子课堂建立起来，遍布全球的 91 个国家。

最后，移居海外的三千八百万中国人依旧和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也为汉语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在海外学习汉语或中国传统文学相关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机会。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当代世界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的发展，它的影响力也将增大。因为中国在近代发展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它现在的发展并非来自对西方的学习，而是它沉睡了两百年的文化内部的条件所致。1978 年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决定推动市场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空间，迅速得到了显著成效，这是因为这一切对于一个两百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社会毫不陌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极大，正处于加速转型期。有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产生政治上的紧张局面，出现更加类似于西方的政府。然而这些也有可能不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从未出现过欧洲在十九世纪所经历的文化上的分裂。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民族认同感的社会，其现代化过程是中国文化的扩展过程，从时间涵义上看，它既具有长远性而又关注现实。要理解充满矛盾的中国社会，就必须理解它千年文化背后的深层含义，这就需要中文作为载体。

汉语是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它将在许多方面成为跨国交流的通用语，在亚洲尤其如此，这并非大胆猜测。掌握汉语带来的益处不仅是商机。学习中文就必须记住数以千计的汉字，这一记忆过程有助于培养中国人的特质，对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社交方式至关重要。二十一世纪，世界多极化秩序的逐渐成形带来了许多机遇，而鼓励民众学习中文的国家则有可能更好地抓住这些机遇。

四、智利的成果

当 1990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包括智利在内的拉美五国之时，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从那时起，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不断加强。拉丁美洲对于中国来说尚且还是一个较小的市场，但是在这个十年中双边贸易往来增长迅猛。

中国经济的活力、政府和企业的兴趣促进了拉丁美洲的出口，同时也有助于吸引对自然资源开采项目的直接投资。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对在拉美拓展业务、发展多样化的出口有着极大的兴趣。

最后，我们应该重视中国在拉美采取的积极外交政策，这展示出了中国成为世界性而不是地区性强国的意愿。比如中国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兴趣，以及在 20 国集团中的积极参与。20 国集团各成员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具有共同立场，由巴西牵头，智利也是其成员国。

智利也选择了广泛参与世界经济。因此，我们的贸易协定为与中国及中国企业建立特殊的潜在关系开拓了道路，也为中拉之间大量的投资以及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可能。

“智利 国家—平台”试图鼓励中国企业们充分利用智利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开放市场，在智利开展加工业务再出口。

（一）智利和中国的关系

最早到达智利的中国人可以追溯到 1850 年。中智友谊源远流长，自 1915 年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两国的相互认识与交流不断加强。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期间，智利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迈出了两国关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也使得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在经济领域，智利和中国同处于太平洋周边，共同参与这一地区合作机制。除此之外，两国还在许多多边机制中展开对话与合作，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以及东亚—拉美论坛(FALAE)。毫无疑问，两国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莫过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体现出两国政府不仅有意巩固经济关系，而且希望加强科技、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共同发展。这一自由贸易协定使中智两国间贸易额在 2010 年达到 170 亿美元。

中国向智利一些水果类产品和畜牧产品开放了市场，中国苹果也进入了智利市场。尤其突出的是两国间建立开发铜资源的战略联盟。智利铜产量居世界第一，而中国是它最重要的客户。智利承诺在至少 15 年间向中国年出口铜 55 千吨以上。这是中国五矿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签署的协议中的一部分内容。智利国家铜业公

司预期中国对铜矿的需求会继续增长（估计在每年 30 万吨左右。另外，中国企业在铜资源开发中的投资以及在智利建立船公司也将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二） 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第八章主要关于两国合作，其中第 104 条强调巩固和拓展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这一条款重申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注重经济、金融、技术、教育和文化方面，体现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和原则。

值得强调的是，第八章中第 107 条详细说明了教育方面的协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关于建立教育合作协议，推动就业网络和互相理解，加强教育领域工作的联系。

第二，促进双方有关教育的组织机构的相互交流，以确保教育系统发展的质量。例如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初、中、高等教育以及工业和技术培训方面的合作。

第三是关于教育合作的重点，也就是信息交流、科技援助、材料展示、项目设计与实施、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合作、在互利项目中的教师和学生交流。

在教育体系和政策的框架下，信息的掌握对资格评估和转化意义非凡。应当指导和促进经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让双方可以互相转换学分，互认专业学位。合作发展在教育支持和基础资源方面的创新的质量，发展教师职业培训。

（三） 智利的汉语教学

智利的语言政策已初见雏形。60 年代以前，要从中学教育毕业就必须通过语言考试（随机选择英语或法语），这种考试在 1967 年取消。70 年代初智利学生参与了国际英语和法语水平测试，结果虽不尽人意，却没有让智利产生于国际教学标准接轨的紧迫感。

十九世纪只有掌握法语才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才有机会达到特权地位。二十世纪掌握英语是必须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种种迹象表明应当掌握多种语言。于是汉语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在圣地亚哥举行的 APEC 论坛有着两点里程碑式的意义：自由贸易协定和教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第二年，两位中文老师到达智利，在三所学校教授 200 名学生。参与这一项目的市级机构有：奇廉市马尔塔·布鲁内特女子中学，比尼亚德尔马市何塞·弗朗西斯科·威尔卡拉中学，瓦尔帕莱索市弗朗西斯科·阿拉亚·贝内特中学和蓬塔阿雷纳斯市麦哲伦大学附属中学。在教育部部长 Sergio Bitar 的推动下，教育部国际事务处积极倡导这一项目。到第三年，共有三位教师在四所中学教授 350 名学生。而在大学教育中，两所孔子学院分别在天主教大学和圣·托马斯大学成立。2008 年智利教育部在“语言拓宽道路项目”(Programa

Idiomas Abren Puertas)中引入了中文项目。到 2010 年，智利共有 11 名由中国政府派出的中文教师，并且举办了汉语对话比赛。在短短六年时间内，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学达到 26 所，学生超过 3500 人。

在第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后，为了考察掌握水平，学生将参加中小學生汉语考试(YCT)，通过的学生将获得官方颁发、国际认可的证书。圣地亚哥中华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这一举措，并在智利承办这一考试。

共有 140 名学生参加考试。38%的考生在一级测试中获得了最高成绩：一级甲等。结果成效显著。中国政府大力赞扬了智利中文教学的战略性进展，国家汉办主任许琳通过智利教育部部长莫妮卡·希门内斯邀请获得满分的学生前往中国参加青年夏令营。仅仅一年以前，智利教育界组团访华，拜访汉办时还曾表示智利学生无法参加夏令营，因为即使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够那么参加夏令营也没有意义。在这样的鼓励机制下，15 位智利青年于 2009 年 12 月出发，第一次参加了夏令营。在学生们和中智两国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事实证明智利人也可以把中文学得很好。智利教育部即将设立孔子学院，中智文化联盟必将为两国的年轻人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书目

- [1] Adshead, Samuel: *China in World History*, Macmillian Press, Tercera Edición, 2000
- [2] Fallows, James: How America Can Rise Again. *The Atlantic Monthly*, Jan-Feb,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print/201001/american-decline>
- [3] Ferguson, Niall: "The decade the world tilted east" *Financial Times*, 27 de Diciembre del 2009.
- [4]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Ed. Penguin
- [5] Graddol, David: "The Future of Language" *Science*, Vol. 303 (5662), p 1329-1331, 2004
- [6] Plate, Tom: "China Matters –one way or another" *Business Time*, Singapore, p.12, 1999.
- [7] Pomeranz, Kenneth :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8] Ramzy, Austin: "Get Ahead, Learn Mandarin" *Time Magazine – Asia*, June 19, 2006.



UNIVERSIDAD ADOLFO IBÁÑEZ
ESCUELA DE GOBIERNO

